

# 西方劳工地理学研究进展及对中国的启示

黄耿志<sup>1,2</sup>, 张虹鸥<sup>1,2</sup>, 王 洋<sup>1,2</sup>, 金利霞<sup>1,2</sup>, 陈昆仑<sup>3</sup>

(1. 广州地理研究所, 广州 510070; 2. 广东省地理空间信息技术与应用公共实验室, 广州 510070;  
3. 湖北大学, 武汉 430062)

**摘 要:** 与新古典工业区位论和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地理学论将工人视为一种生产要素和抽象劳动力不同, 劳工地理学将工人视为具有能动性的社会主体, 研究工人如何按照自身的意愿创造有助于自身生存和再生产的空间。这种劳工认识论的转变在国际经济地理学界产生了极大和持续的反响, 促使劳工地理学发展成为具有独特概念体系的经济地理子学科。本文梳理了近20年西方劳工地理学的研究进展, 围绕工人能动性的概念、表现形式、形成机制以及它与空间、尺度、地方、全球生产网络之间的关系展开分析。最后基于劳工地理学前沿问题的分析, 认为中国劳工地理研究应重点关注中国特色工会体制下工人能动性的构成、经济地理影响与形成的地域条件, 并探索有助于社会升级的制度安排。开展劳工地理研究有助于拓展经济地理学的劳动力研究范畴, 对认识中国市场经济深入发展时期面临的劳资矛盾和探索共享发展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劳工地理学; 劳动力; 工人能动性; 空间; 全球生产网络; 社会升级

## 1 引言

经历近40年的快速发展, 中国当前不仅步入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发展攻坚时期, 而且也面临着市场经济深入发展背景下日益凸显的劳资矛盾和社会治理挑战。一方面, 产业结构调整、产业转移和技术升级(如机器换人)等正在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不确定的影响; 另一方面, 伴随劳工维权意识的增强, 长期依赖廉价劳动力的工业化模式引发了日益增多的劳资争议和劳工抗争事件(蔡禾, 2010)。在2004-2014年的10年期间, 全国劳工争议案件数增长1.75倍, 从26.0万件增加到71.5万件(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等, 2016)。上述现象表明, 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正在面临波兰尼式“反向运动”的

挑战(Friedman, 2013)。面对这个挑战, 中国高层政府高度重视并积极响应, 从胡锦涛主席的“和谐社会”理念到习近平主席的“共享发展”战略, 无不显示出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追求资本积累与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辩证平衡(Huang et al, 2014)。在此政治经济背景下, 如何认识各种形式的劳工抗争行为及其影响、最大限度化解劳资矛盾成为中国市场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

由 Andrew Herod 在 1997 年提出的劳工地理学<sup>①</sup>, 为地理学者介入这个领域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工具。劳工地理学批判了新古典区位论把劳工视为一种生产要素的视角, 而将劳工视为与资本一样具有“空间修复”能力的社会和地理行动者, 通过自身的社会空间实践, 有意或无意地塑造资本主义经济

收稿日期: 2017-04; 修订日期: 2017-09。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771137); 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15A030313842); 广东省科学院引进高层次人才专项资金项目(2016GDASRC-0101)[Foundation: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41771137;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No.2015A030313842; The High-level Leading Talent Introduction Program of GDAS, No.2016GDASRC-0101]。

作者简介: 黄耿志(1986-), 男, 广东汕尾人, 副研究员, 主要从事城市化、非正规经济和劳动力研究, E-mail: hhhgz@126.com。

①将“labor geography”翻译为劳工地理是为了突出作为社会行动者的工人对经济地理景观的塑造作用, 区别于关注劳动力空间差异的劳动力地理(geography of labor)。

引用格式: 黄耿志, 张虹鸥, 王洋, 等. 2017. 西方劳工地理学研究进展及对中国的启示[J]. 地理科学进展, 36(10): 1185-1195. [Huang G Z, Zhang H O, Wang Y, et al. 2017. A review of labor geography research in the West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hina[J]. Progress in Geography, 36(10): 1185-1195.]. DOI: 10.18306/dlkxjz.2017.10.001

景观。这种对劳工作用认识的转变在过去20年国际经济地理学界引起了广泛和持续的响应。相比之下,国内地理学仍主要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视角,研究作为一种区位因素的劳动力的空间分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刘彦随等, 2010; 刘霄泉等, 2011; 俞万源, 2011; 王利伟等, 2014)<sup>②</sup>,对国际上蓬勃发展的劳工地理研究尚未给予应有的关注。为此,本文通过梳理国外劳工地理学的研究进展,以期开启中国劳工地理研究和认识中国劳资矛盾问题提供理论基础,并基于劳工地理学前沿问题的分析探讨中国劳工地理研究的议题。

叶奇等(2004)、金利霞等(2013)曾在有关西方劳动力地理学的综述中提到劳工地理学,但主要关注点为地方劳动力市场管制,未能梳理以研究工人能动性为主旨的劳工地理学。两者虽然都是经济地理学研究劳动力的视角,但前者关注劳动力市场的社会管制或地方管控体制,分析对象不是劳工,而是一系列管控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社会和制度机制及其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Jonas, 1996; Peck, 1996)。与此相反,后者将劳工置于分析的中心,研究工人如何应对资本主导的结构性限制的能动性,已发展成为具有独特概念体系的经济地理学子学科。贺灿飞等(2014)将劳工地理学列为西方经济地理学8大研究热点之一,说明了其兴起的学科和现实基础,但没有系统梳理其研究进展和前沿问题,对劳工地理学关注什么、涉及哪些概念和理论尚不清楚。本文将围绕工人<sup>③</sup>能动性及其与空间、尺度、地方、全球生产网络的关系揭示劳工地理学的面貌。也是对蔡运龙等(2016)在“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及其中国化”的讨论中呼吁开展中国劳工地理研究的一种响应。

## 2 劳工地理学的界定:工人能动性及其空间性

### 2.1 劳工地理学的提出

经济地理学真正把劳动力问题置于学科分析的中心位置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劳工地理学

的提出。在新古典工业区位论中,劳工仅被当做与资本、原材料、设备一样的生产要素,其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体现在不同地区的工资水平、工人技能的空间差异。劳工在经济地理分析中被简化为可计算的劳动力成本。新古典区位论所关注的是资本家如何根据劳动力的空间分布做出投资决策,以及这种分布差异如何影响资本主义经济地理。1970年代,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地理开始兴起,与新古典区位论将空间视为均质“容器”不同,它强调空间与资本积累之间的关系,将空间的生产视为资本积累的条件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内在组成部分(Harvey, 1982; Massey, 1984)。然而,虽然不再将劳工视为简单的成本因素,并强调劳资关系对资本主义经济景观的塑造作用,但劳工仍然只是被当作一个具有交换价值的抽象劳动力和资本积累逻辑下的被动受害者(Coe et al, 2008)。换言之,资本不断通过“空间修复”的方式创造有助于其生产和再生产的特定空间,而劳工在这个过程中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

新古典区位论和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地理学的共同点在于从资本/企业的角度理解资本主义经济地理,而把劳工置于被动的边缘位置。Herod (1997a)认为以资本为中心的认识论是有局限的,因为它忽视了劳工在经济景观演变中的作用。他因此在1997年提出了劳工地理学(Labor Geography),以区别于将劳工视为生产要素的劳动力地理学(Geography of Labor)。劳工地理学的目标是研究工人如何根据自身的利益和需求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创造有利于自身生存和再生产的空间,尽管这个过程处于资本主导之下。劳工被视为与资本一样具有“空间修复”能力的社会主体,通过自身的社会和空间实践有意或无意地塑造经济景观。这种对劳工的重新理解在理论论上获得马克思主义底层历史学派和自治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支撑,两者均强调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Cumbers et al, 2010)。但这并非否定资本的作用,而是试图从劳工的角度理解资本主义经济地理。正如Herod(1997a)所说,如果新古典区位论是一种

②基本包括3个方面:产业发展与劳动力空间变化的相互关系,城市产业空间重构对劳动力分布的影响,农村经济与农村劳动力变化的关系。

③本文对工人和劳工的交替使用没有本质的区别,在英文文献中,worker agency 和 labor agency 的用法均存在。相对而言,劳工指工人的总体,一般使用于抽象的语境,与资本对应,如劳资关系;工人一般使用于具体的语境,如产业工人、建筑工人。工人能动性的使用也是为了突出工人作为具体的社会主体的意义。

理解资本家空间行为的理论,劳工地理学则是地理学者认识工人社会空间行为的理论工具。

## 2.2 工人能动性及其空间性

Herod的研究提议在国际经济地理学界引起了巨大响应,并在Castree(2007)、Coe(2013)、Peck(2017)等著名经济地理学者的推动下取得显著的进展。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成果,我们先总结劳工地理学的核心概念——工人能动性以及其所具有的空间性。这种空间性既表明空间、地方、尺度对劳资争斗的影响,也体现了地理学研究劳工问题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独特视角。实际上,劳工地理学的基本目标就是构建一个空间视角的工人能动性理论。

### 2.2.1 工人能动性的概念与类型

能动性是一个与结构相对应的概念。在Herod(1997a)的开拓性论文中,工人能动性指在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下,工人按照自身的意愿和需求而采取的有助于改善自身生存和再生产条件的行动或策略。随着研究的推进,能动性被进一步划分为对应不同效应的3种类型(Coe et al, 2011):①适应/弹性(Resilience),指工人以应付现状或困境为目的的微观实践,不改变既定的劳资关系;②重制(Reworking),指反对现存的劳资关系,以寻求资源再分配和改善物质条件的行动;③抵抗(Resistance),指直接挑战和颠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获得对自身劳动力和时间的自由支配。显然,最后一种能动性在当今世界几乎不可能发生。因此,劳工地理学所指的工人能动性包括适应和重制,前者一般涉及工人个体隐蔽的和日常的行为(如偷懒、迁移、换工、兼职等),后者包括工人的个体行为(如投诉、上访等)和集体行动(如罢工、抗议等)。

### 2.2.2 工人能动性的空间性

工人能动性的空间性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一是行动条件的地域性。所有工人都因为家庭、居住和工作的关系而嵌入特定空间,这不仅影响工人行动的空间目标,而且使行动的可能性受到其所在地方的制度、经济、社会关系和物质空间形态的影响(Herod, 2003; Coe, 2013)。前者如强烈依恋地方的工人群体倾向于采取保护地方经济的行动,以确保自身的就业和福利,尽管这可能会造成对其他地方工人同胞的损害;后者如工会制度的不完善使特定地方的工人缺失集体力量,而只能采取个体化的行为方式。

二是行动目标的空间尺度。由于工人再生产

的空间嵌入性,工人行动的目标常常面临空间尺度的抉择。以特定行业的工资谈判为例,将有3种空间层次的目标:在全国范围实行统一的工资水平、根据不同地方的生活成本实行地方差别化的工资水平、实行与企业经营情况挂钩的工资水平(Herod, 1997b, 2003)。不同空间目标的选择将影响到行动的策略、过程以及最终的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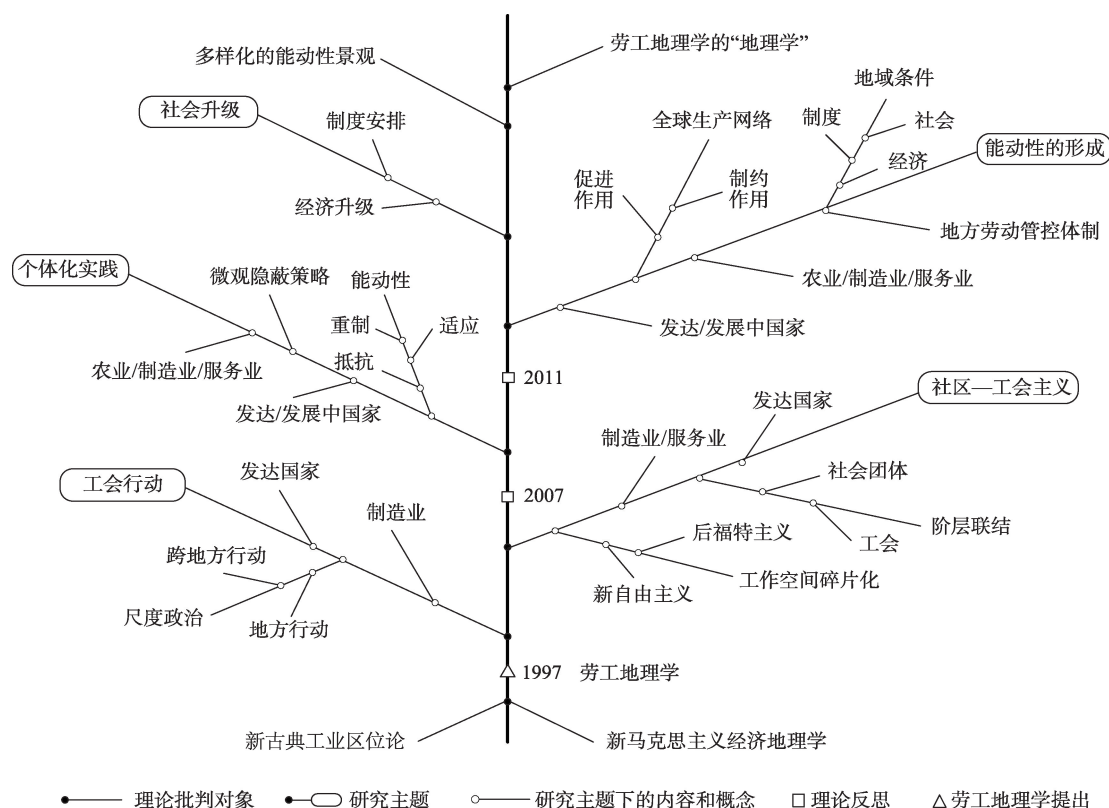
三是行动的尺度政治抑或工人的空间策略。包括2类:①跨地方行动,包括在国际、国家和国家次区域尺度的工人跨地迁移,以及利用工会网络寻求跨地方的工人阶层联结;②具有跨地方影响力的地方行动,包括工场尺度的抗议行动、多工场联合的抗议行动,以及工会与社区组织(如女权组织、志愿者组织、环保组织等)合作的跨阶层联合行动(Lier, 2007)。

四是工人行动效应的空间性。表现在3个方面(Castree et al, 2004; Rainnie et al, 2011):①尺度效应。工人行动可在地方、区域、国家和全球等产生不同尺度的影响,对资方造成不同程度的压力;②牛鞭效应(Bullwhip Effect)。工人在某一地方发起的行动(如停工)可导致其所在的整个生产网络的瘫痪(尤其对全球生产网络而言),进而影响其他地方节点的正常生产秩序;③正义的地理困境。某一地方的工人行动所获得的利益可能损害其他地方工人的福利。例如,B地工人阻止企业将生产任务外包给A地或阻止企业迁移至A地的行动,将导致A地工人工作机会的减少和福利受损。这个困境反映了当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工人阶层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地理关系。综上,工人能动性从其形成条件、目标、表现到效应均体现了空间性,下文将进一步解释这种空间性。

## 3 劳工地理学的研究进展

劳工地理学基本上经历了1990年代的建立期到2000年以后的扩展期,在此期间分别在2007年和2011年经历了2次深刻反思,这2次反思极大推动了劳工地理学的发展。图1刻画了过去20年劳工地理学的发展脉络,显示它在工人能动性的概念、表现形式、形成机制以及所涉及的概念、经济部门、地域背景等方面的深化和拓展,表现在:从只关注工会行动的单一能动性到关注包括个体和集体行为在内的多样化能动性,从只关注能动性的表现





说明:① 根据近20年主要的劳工地理研究文献梳理而成,其中对研究主题的划分综合参考Castree(2007)、Lier(2007)、Coe等(2011)、Selwyn(2013)、Peck(2017)的研究工作;② 该图枝干主要围绕劳工地理研究主题、概念与所关注国家和经济部门而建构。

图1 西方劳工地理学的发展脉络(1997-2016)

Fig.1 Progress in the Western labor geography (1997-2016)

拓展至能动性的形成条件,从只关注制造业工人拓展至农业和服务业工人,从只关注发达国家拓展至发展中国家。劳工地理学通过与能动性、全球生产网络、地方劳动力管控制体制等理论的交叉,推动上述拓展和完善概念体系。此外,在方法论上,不同于劳动力地理学主要采用数量统计方法揭示劳动力的空间格局,劳工地理学关注劳工影响经济地理过程的具体方式和因果机制,因而一般使用民族志、访谈、档案分析、案例(事件)分析等质性研究方法(Herod, 2000a)。

### 3.1 工会、集体行动和尺度政治

工会对企业行为的制约是劳工塑造资本主义经济地理的主要表现(Herod, 2000a),也是劳工地理学提出初期对工人能动性研究的重点,通常关注工会活动活跃的发达国家。研究论证了工人如何借助工会力量发起地方性和跨地方性的集体行动来阻止资本作出的不利于劳方的行为,如降低工资、外包生产任务、区位转移;或促进资本作出有利于

劳方的行为,如改善工作环境、提高工资等,从而影响资本主义经济景观的塑造和改善自身再生产的条件(Aguilar et al, 2009; Mills et al, 2009; Tufts et al, 2009; Gialis et al, 2014)。典型的研究如,Herod (2000b)分析了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弗林特市金属冲压厂工人通过工会组织的地方性罢工致使生产系统瘫痪,并进而导致承担其他生产任务的其他工厂停工或关闭,最后促使通用公司兑现改善工作环境的承诺。Cumbers等(2016)研究了英国林赛炼油厂工会如何利用全国化工行业的工会网络发起跨地方的罢工行动,以阻止公司将生产订单分包给廉价的外地企业的全球化策略。这类研究关注在全球生产分散化的背景下,如何促进工会的组建与创新劳工实践方式,强调通过尺度政治的运用增强集体行动的力量,以应对资本全球化对劳工产生的不利影响,其策略包括在国际、国家和区域尺度上的跨地方联合行动和具有跨地方影响力的地方性行动。认为经济全球化在使资本获得更大范围的空

间流动能力并由此削弱劳工力量的同时,也赋予劳工能动性新的潜力和可能性。这个结论激发了劳工地理与全球生产网络研究的对话,我们将在后文继续讨论这一点。

### 3.2 社区—工会主义与地方跨阶层联结

虽然工会是工人能动性的重要表现,但19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已使工会力量遭到削弱。与此同时,经济组织模式由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的转变产生了大量临时的、短期的和不稳定的工作,导致工作场所与雇佣关系在组织上和地理上的碎片化(Dicken, 2003),使得传统工会组织陷入困境。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被称为社区—工会主义(Community Unionism)的能动性,它强调的不是尺度的跃升,而是尺度的在地强化,即工人团体或工会如何基于共同的意愿和目标联合其他市民社会团体发起跨阶层的地方行动,由此造成巨大的舆论压力促成目标的实现(Castree, 2000; Waterman et al, 2001; Wills, 2001; Lier et al, 2006)。许多案例研究分析了工会如何将劳工议题与环境保护、性别歧视、身份认同、种族偏见等城市社会议题建立联系,从而与环保组织、女权组织、同性恋团体、少数族裔团体等社会团体形成阶层联盟(Pastor, 2001; Sadler, 2003; Jepson, 2005; Smith, 2015),由此推动社会公正和资源再分配的目标。社区—工会主义为传统的工会提供了新的组织尺度,使工会力量得以覆盖工作不稳定、空间分散的工人团体(Jordhus-Lier, 2013),尤其是清洁工、保姆、保安等城市低端服务业工人。社区—工会主义因此被认为是当前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背景下工会创新组织策略、增强工人能动性的重要途径(Atzeni, 2016)。在这个意义上,社区—工会主义构成了Tufts(2009)所说的“熊彼特式工会主义”的当前形态,后者刻画了在不断变化的政治经济环境下出现的介于纯行业工会行动与社会运动之间的类工会行动。

### 3.3 个体化工人的社会空间实践

2007年,Castree(2007)和Lier(2007)不约而同地对劳工地理学进行了第一次深刻反思,认为过去10年(1997-2007)的劳工地理研究过度关注工会,在理论上将能动性等同于集体行动、在经验上集中在发达国家,而忽视了缺乏工会组织的个体化工人,导致对能动性概念理论化的欠缺。这次反思推动了对发展中国家工人能动性的研究与能动性概念的重新审视。许多学者开始关注在工会组织缺失的

条件下,个体工人如何通过各种微观的、隐蔽的策略应对资本积累逻辑。最先响应的是Rogaly(2009)对印度卡特瓦农业工人的研究,它揭示了个体移民工人如何通过迁移、谈判和自雇佣的方式改善自身的再生产条件。后来对椰子采摘业(Sportel, 2013)、建筑业(Berntsen, 2016)、呼叫服务业(James et al, 2012)、文化产业(Warren, 2014)等工人的案例研究进一步揭示了个体工人多种多样的社会空间实践,包括利用社会关系形成自助网络,利用已有的工作经验跳槽实现向上流动,换工以躲避苛刻的劳动体制,兼职以改善收入状况,利用劳动力短缺状况或自身劳动技能与企业讨价还价,组成小团体以增加谈判的权力等。不同于集体行动的跨地方尺度,这些个体实践渗入工场、社区、家庭等微观尺度的劳动过程和日常生活领域,体现了Scott(1985)所提出的“弱者的武器”。研究认为,个体化能动性虽然不能改变劳资关系,但以微小、渐进的方式改善工人的工作和生活处境,对资本主义组织和劳动过程产生间接的影响,对理解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工人能动性、经济转型和劳资关系变化具有重要意义(Hasting, 2016)。对个体化能动性的研究推动了劳工地理与能动性理论的对话,促进了工人能动性概念的完善,体现在Coe等运用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与Katz的能动性理论重新审视工人能动性概念,并将其具体化为适应、重制和抵抗3种基本类型,实现了集体和个体能动性在概念上的统一(Coe et al, 2011, 2013)。此概念已成为当前劳工地理研究的基本分析框架,推动学者共同致力于揭示适应和重制2类能动性的表现形式及其影响。

### 3.4 能动性的形成:全球生产网络和地方条件

2011年和2013年,Coe在《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连续撰文对劳工地理学进行了第二次反思(Coe et al, 2011; Coe, 2013),认为劳工地理学对工人能动性的表现形式已取得长足的研究进展,然而研究忽视了影响这些能动性形式及其效应的结构性因素,值得深思的问题是:如何理解一个地方的工人能动性的表现形式?为什么有些能动性在某些地方存在并取得效果,而在某些地方则出现相反的结果?Coe(2013)认为工人能动性不是独立地存在,而是受全球生产网络(GPN)的影响,并嵌入工人所在地方的特定制度、经济和社会关系中的社会空间实践。这一主张得到学界的积极响应,并激发了劳工地理学与全球生产网络和地方劳动力管

控体制(Local Labour Control Regime, LLCR)理论的对话。

#### 3.4.1 全球生产网络对能动性的影响

全球生产网络既制约又促进工人的能动性。制约主要体现在(Herod et al, 2007; Ruwanpura, 2016):①全球生产网络使资本减少对特定地方劳动力的依赖,削弱工人或工会的力量;②生产分包模式造成地理分散的劳动空间与非正规的雇佣关系,削弱工人组织的物质条件;③全球市场的低迷或竞争加剧会使地方企业实施更加严格的劳动管理,使工人更难获得资本的让步。

促进主要体现在:①国际生产商或购买商要求地方企业采取符合其企业社会责任(CSR)的工作规范和准则,如遵守当地劳动合同法,8小时工作制和最低工资线等(Lund-Thomsen et al, 2015);②工人在GPN的位置使其获得结构性权力(Selwyn, 2012),包括:一是基于生产环节的权力,指处在关键生产环节节点的工人,其罢工或停工可影响整个生产网络的正常运行——即牛鞭效应,意味着工人虽然被局限于地方,并被生产分散化所分割,但只要在某个战略性的生产节点发起行动,就可以制约整个生产网络,获得与资本谈判的筹码。例如,Bollhorn等(2016)分析了德国一家汽车制造企业工人如何利用汽车生产网络的弱点反对企业被收购,最终使企业收回资本重组的决策。二是基于劳动市场的权力,指在劳动力短缺的条件下,企业难以找到替代的劳动力,工人在谈判中占据主动和优势地位。例如:Kiil等(2016)分析了瑞典护士如何通过拒绝入职和离职造成当地护士供给陷入短缺,从而推动护士入职工资的提高;Guthman(2017)对美国加州草莓种植业的研究则发现,劳动力短缺增强了种植工人的谈判权力,但企业也可通过技术改进来削弱这种权力。

#### 3.4.2 能动性的地方条件

全球生产网络对工人能动性的影响最终通过地方因素而起作用。例如,在劳动监管不足的地方,跨国企业对当地企业的CSR要求很难被落实;工人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结构性权力也需通过集体行动才能发挥应有作用,而后者能否实现则依赖于地方的劳工管制。因此,工人能动性的形成与地

方劳动力管控体制<sup>④</sup>密切相关(Riisgaard et al, 2011)。研究发现,工人能动性受到地方劳工制度/政策、政府态度、劳动力市场特征、企业雇佣策略、性别观念、社会等级、家庭分工等制度、经济和社会因素的影响(Carswell et al, 2013; Lund-Thomsen, 2013; Hauge et al, 2016)。例如,Lund-Thomsen(2013)以巴基斯坦耐克足球制造工人为例,揭示了处于不同生产网络类型的工人能动性如何受到当地性别化的劳动力市场、企业雇佣模式、工人职住距离等因素的影响。Carswell等(2013)对印度服装出口制造业的研究显示,工人能动性受到当地种性制度、性别观念和家庭经济模式的影响。例如,种性等级促进了高等级工人的能动性,而制约了低等级工人的能动性;家庭分工制约了已婚女工的就业实践,使其只能选择灵活的小作坊工作。这些研究表明,对工人能动性的理解必须将其置于其所在地方的特定生产和再生产地理中。工人能动性与地方是辩证的关系,工人发挥其能动性创造有助于自身再生产的地方,而地方则塑造了工人的能动性。

#### 3.5 劳工地理学的政策涵义与社会升级

以资本为中心的经济地理研究常常通过经济升级而介入政策话语。近年来,劳工地理学者开始从社会升级的角度思考劳工地理学的政策出口。Barrientos等(2011)区别了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的概念:经济升级指企业从低附加值生产进入高附加值生产,并伴随技术改进、利润增加和竞争力提升的过程;社会升级则指劳动者的工作机会增加、工作质量提高和劳动权利改善的过程。目前,经济地理学者主要关注企业的经济升级,认为经济升级将自动地带来社会升级。然而,劳工地理研究发现,经济升级不一定带来社会升级(Rossi, 2013),甚至在某种情况下会导致社会降级,因为社会升级不仅受企业因素的影响,而且受宏观政策、劳工制度、劳动者和其他社会主体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Pyke et al, 2016)。Selwyn(2013)深刻地指出,经济升级可转化为社会升级,但需要合适的制度安排充当媒介作用,而这种制度安排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劳资权力关系的产物。换言之,经济升级能否转化为社会升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劳资权力关系的平衡以及这种平衡如何被制度化。因此,对劳工地理研

<sup>④</sup> 地方劳动力管控体制指在特定历史时期下,嵌入特定地方的一系列调节生产、工作、消费和劳动力再生产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机制。



究而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通过研究工人能动性对劳资关系的影响,探索有助于促进经济升级转化为社会升级的劳资权力关系及其制度化机制,从而促进企业和工人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 4 中国劳工地理研究议题

从劳工地理研究的发展脉络分析中可识别以下3个前沿问题。一是探索多样化的工人能动性。虽然工会是工人能动性的重要表现,但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工会力量缺失或薄弱条件下的个体形式能动性,因为后者不仅在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而且在新自由主义和后福特主义的政治经济环境下变得更加普遍。Peck、Coe等经济地理学者为此呼吁发展一种多样化、细腻化的能动性概念,以捕捉集体/个体的、正规/非正规的、短暂/持续的以多种形式存在、在多个空间尺度展开的工人能动性(Coe, 2015; Peck, 2017)。正如Peck(2013)所总结的,我们需要发展劳工地理学的“地理学”,而不只是关注发达国家。二是探索形塑工人能动性的地域条件。不同于社会学者,地理学者的任务不仅要识别工人能动性的表现形式,而且需要揭示这些能动性为何如此以及可能的地域因素。Coe(2015)因此提出了“多样化的能动性景观(Variegated Landscapes of Agency)”概念,以理解在特定历史时期(特定政治经济结构下)特定地方的工人群体如何创造有助于自身再生产的社会空间,以及这个过程如何受到地方制度、经济和社会因素的影响。三是通过研究工人应对资本积累逻辑的能动性,揭示劳资权力关系变化的动力,以探索更加平衡的劳资权力关系和有助于社会升级的制度安排。

基于上述前沿问题,中国劳工地理研究应重点关注以下4个方面。

(1) 研究中国特色工会体制下工人能动性的构成。虽然中国建立了工会制度,但在现阶段工会的作用较为有限,特别在民营企业,工会大多受到资方影响,在维护劳工利益方面未能发挥有效的作用。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工人采取哪些社会空间策略应对资本积累逻辑和改善自身再生产的条件?需要研究集体行动(如停工、抗议)发生的机制以及在社区、工场、家庭等微观尺度并渗入社会再生产领域的个体化工人的社会空间实践,如迁移、回流家乡、兼职、自雇佣、求助草根组织等。

(2) 研究工人能动性产生的经济地理影响。国内地理学者目前主要将劳动力视为一种生产要素,研究经济空间变化对劳动力空间的影响。然而,劳工地理研究表明,劳工作为能动的社会主体也对经济空间变化产生作用。值得研究的是,以集体和个体形式存在的工人社会空间实践(包括停工、劳资争议事件、个体抗争行为等)具有什么样的经济地理影响,如对地方劳动力市场、投资环境、产业转移的影响以及对其他地方工人工作和生活的影响等。这将有助于从劳工的视角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经济转型和空间重构。

(3) 研究中国工人能动性景观形成的地域因素。在考虑经济全球化因素的影响下,揭示中国工人的能动性如何嵌入其特定的制度、经济和社会关系之中。制度因素如劳工制度、户籍制度、就业政策、产业政策、政府态度等,经济因素如企业对跨国公司CSR的响应、企业新生产技术的应用(如“机器换人”会减少对劳动力的依赖)、劳动力供需状况、劳动力市场中介等;社会因素如社会网络(如同乡关系)、社交媒体的使用(如微信/网络论坛)、草根组织、工人居住模式(社区居住/工厂宿舍居住)、媒体力量等。

(4) 探索有助于经济升级促进社会升级的制度安排。通过研究工人能动性对劳资权力关系变化的作用机制,探索符合当前体制的、更加平衡的劳资权力关系,从劳工的视角寻求有助于促进经济升级转化为社会升级的制度安排,实现企业效益和工人福利的平衡发展,从而为减少劳资矛盾、推动社会稳定和共享发展提供地理学视角的政策依据。

## 5 结语

劳工地理学致力于从空间的视角研究工人能动性的表现形式、影响与形成条件,并探索有助于工人社会升级的劳资权力关系。它关注特定地域条件下工人如何应对和挑战资本积累逻辑,以及由此造成的对经济景观的潜在影响。劳工地理学的蓬勃发展不仅与19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和经济全球化对工作空间和劳资关系产生的深刻影响有关,而且源于其为地理学者推动社会公正提供了一个理论工具。西方劳工地理学的概念体系将有助于我们开展中国背景下的劳工地理研究。不仅对

目前国内地理学主要将劳动力视为一种生产要素的劳工研究形成理论视角的补充,从而拓展学科研究范畴,而且对认识中国市场经济深入发展时期面临的劳资矛盾和探索共享发展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蔡禾. 2010. 从“底线型”利益到“增长型”利益: 农民工利益诉求的转变与劳资关系秩序[J]. 开放时代, (9): 37-45. [Cai H. 2010. From "bottom-line" benefit to "incremental" benefit: The change of the appeal for benefit of farmers-turned-workers and the order in industrial relations[J]. Open Times, (9): 37-45.]
- 蔡运龙, 叶超, Barnes T, 等. 2016. 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及其中国化: 规划与实践反思[J]. 地理研究, 2016, 35(8): 1399-1419. [Cai Y L, Ye C, Barnes T, et al. 2016. Marxist geography and its development in China: Reflections on planning and practice[J]. Geographical Research, 35(8): 1399-1419.]
-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 2016.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2015[R].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Department of Population and Employment Statistics of 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Department of Planning and Finance of the Ministry of Human Resources and Social Security. 2016. China labour statistical yearbook 2015[R]. Beijing, China: China Statistics Press.]
- 贺灿飞, 郭琪, 马妍, 等. 2014. 西方经济地理学研究进展[J]. 地理学报, 69(8): 1207-1223. [He C F, Guo Q, Ma Y, et al. 2014. Progress of economic geography in the West: A literature review[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69(8): 1207-1223.]
- 金利霞, 李郇. 2013. 西方现代劳动力地理学研究进展及对中国研究的意义[J]. 人文地理, 28(3): 7-14. [Jin L X, Li X. 2013. Progress in the study of modern labour geography in Western countries and the significance for China[J]. Human Geography, 28(3): 7-14.]
- 刘霄泉, 孙铁山, 李国平. 2011. 北京市就业密度分布的空间特征[J]. 地理研究, 30(7): 1262-1270. [Liu X Q, Sun T S, Li G P. 2011. Research on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employment distribution in Beijing[J]. Geographical Research, 30(7): 1262-1270.]
- 刘彦随, 李裕瑞. 2010. 中国县域耕地与农业劳动力变化的时空耦合关系[J]. 地理学报, 65(12): 1602-1612. [Liu Y S, Li Y R. 2010. Spatio-temporal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farmland and agricultural labor changes at county level in China[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65(12): 1602-1612.]
- 王利伟, 冯长春, 许顺才. 2014. 传统农区外出劳动力回流意愿与规划响应: 基于河南周口市问卷调查数据[J]. 地理科学进展, 33(7): 990-999. [Wang L W, Feng C C, Xu S C. 2014. Return inten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a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area and planning response: Based on a questionnaire survey in Zhoukou, Henan Province[J]. Progress in Geography, 33(7): 990-999.]
- 叶奇, 刘卫东. 2004. 西方经济地理学对劳动力问题的研究进展[J]. 地理学报, 59(S1): 191-197. [Ye Q, Liu W D. 2004. Progress in the study of labor issues by economic geographers in Western countries[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59(S1): 191-197.]
- 俞万源. 2011. 基于产业协调的“双转移”战略背景下广东欠发达山区劳动力转移分析: 以梅州市为例[J]. 地理科学, 31(5): 576-580. [Yu W Y. 2011. Labour transfer in less-developed mountainous areas of Guangdong under context of "Industry and Labour Transfer" strategy based on industry coordination: Taking Meizhou City as an example[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31(5): 576-580.]
- Aguiar L L M, Ryan S. 2009. The geographies of the justice for janitors[J]. Geoforum, 40(6): 949-958.
- Atzeni M. 2016. Beyond trade unions' strategy: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recarious workers organizing in the city of Buenos Aires[J]. Labor History, 57(2): 193-214.
- Barrientos S, Gereffi G, Rossi A. 2011. Economic and social upgrading in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A new paradigm for a changing world[J]. 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 150(3-4): 319-340.
- Berntsen L. 2016. Reworking labour practices: On the agency of unorganized mobile migrant construction workers[J]. Work, Employment and Society, 30(3): 472-488.
- Bollhorn K, Franz M. 2016. Production network knowledge as a foundation for resistance: Workers influence on a Chinese acquisition in Germany[J].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 107(4): 407-420.
- Carswell G, de Neve G. 2013. Labouring for global markets: Conceptualising labour agency in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J]. Geoforum, 44: 62-70.
- Castree N. 2000. Geographic scale and grass-roots internationalism: The Liverpool Dock dispute, 1995-1998[J]. Eco-



- conomic Geography, 76(3): 272-292.
- Castree N. 2007. Labour geography: A work in progres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31(4): 853-862.
- Castree N, Coe N, Ward K, et al. 2004. Spaces of work: Global capitalism and geographies of labour[M]. London, UK: SAGE Publications: 233-251.
- Coe N M. 2013. Geographies of production III: Making space for labour[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37(2): 271-284.
- Coe N M. 2015. Labour and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Mapping variegated landscapes of agency[M]//Newsome K, Taylor P, Bair J, et al. Putting labour in its place: Labour process analysis and global value chains. London, UK: Palgrave: 171-192.
- Coe N M, Dicken P, Hess M. 2008.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Realizing the potential[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8(3): 271-295.
- Coe N M, Hess M. 2013.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labour and development[J]. *Geoforum*, 44: 4-9.
- Coe N M, Jordhus-Lier D C. 2011. Constrained agency: Re-evaluating the geographies of labour[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35(2): 211-233.
- Cumbers A, Featherstone D, MacKinnon D, et al. 2016. Intervening in globalization: The spatial possibilities and institutional barriers to labour's collective agency[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16(1): 93-108.
- Cumbers A, Helms G, Swanson K. 2010. Class, agency and resistance in the old industrial city[J]. *Antipode*, 42(1): 46-73.
- Dicken P. 2003. Global shift: Reshaping the global economic map in the 21st century[M]. New York, NY: SAGE.
- Friedman E. 2013. Insurgency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The Prolanyian countermovement and Chinese labor politics[J]. *Theory and Society*, 42(3): 295-327.
- Gialis S, Herod A. 2014. Of steel and strawberries: Greek workers struggle against informal and flexible working arrangements during the crisis[J]. *Geoforum*, 57: 138-149.
- Guthman J. 2017. Paradoxes of the border: Labor shortages and farmworker minor agency in reworking California's strawberry fields[J]. *Economic Geography*, 93(1): 24-43.
- Harvey D. 1982. The limits to capital[M]. Oxford, UK: Basil Blackwell.
- Hasting T. 2016. Moral matters: De-romanticising worker agency and charting future directions for labour geography[J]. *Geography Compass*, 10(7): 307-318.
- Hauge M M, Fold N. 2016. Resilience and reworking practices: Becoming the first-generation of industrial workers in Can Tho, Vietnam[J]. *Geoforum*, 77: 124-133.
- Herod A. 1997a. From a geography of labor to a labor geography: Labor's spatial fix and the geography of capitalism[J]. *Antipode*, 29(1): 1-31.
- Herod A. 1997b. Labor's spatial praxis and the geography of contract bargaining in the US east coast longshore industry, 1953-1989[J]. *Political Geography*, 16(2): 145-169.
- Herod A. 2000a. Labor unio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M]//Sheppard E, Barnes T J. A companion to economic geography. Oxford, UK: Blackwell Publishers: 341-358.
- Herod A. 2000b. Implications of just-in-time production for union strategy: Lessons from the 1998 general motors-united auto workers dispute[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90(3): 521-547.
- Herod A. 2003. Workers, space, and labor geography[J]. *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Class History*, 64: 112-138.
- Herod A, Rainnie A, McGrath- Champ S. 2007. Working space: Why incorporating the geographical is central to theorizing work and employment practices[J]. *Work, Employment and Society*, 21(2): 247-264.
- Huang G Z, Xue D S, Li Z G. 2014. From revanchism to ambivalence: The changing politics of street vending in Guangzhou[J]. *Antipode*, 46(1): 170-189.
- James A, Vira B. 2012. Labour geographies of India's new service economy[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12(4): 841-875.
- Jepson W. 2005. Spaces of labor activism, Mexican-American women and the farm worker movement in South Texas since 1966[J]. *Antipode*, 37(4): 679-702.
- Jonas A E G. 1996. Local labour control regimes: Uneven development and the social regulation of production[J]. *Regional Studies*, 30(4): 323-338.
- Jordhus-Lier D C. 2013. The geographies of community-oriented unionism: Scales, targets, sites and domains of union renewal in South Africa and beyond[J].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38(1): 36-49.
- Kiil M B, Knutsen H M. 2016. Agency by exit: Swedish nurses and the "not below 24,000" movement[J]. *Geoforum*, 70: 105-114.
- Lier D C. 2007. Places of work, scales of organising: A review of labour geography[J]. *Geography Compass*, 1(4): 814-833.

- Lier D C, Stokke K. 2006. Maximum working class unity: Challenges to local social movement unionism in Cape Town[J]. *Antipode*, 38(4): 802-824.
- Lund-Thomsen P. 2013. Labor agency in the football manufacturing industry of Sialkot, Pakistan[J]. *Geoforum*, 44: 71-81.
- Lund-Thomsen P, Coe N M. 2015.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labour agency: The case of Nike in Pakistan[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15(2): 275-296.
- Massey D. 1984. *Spatial divisions of labour: Social structures and the geography of production*[M]. London, UK: Macmillan.
- Mills S E, Clarke L. 2009. "We will go side-by-side with you" Labour union engagement with Aboriginal peoples in Canada[J]. *Geoforum*, 40(6): 991-1001.
- Pastor Jr M. 2001. Common ground at ground zero: The new economy and the new organizing in Los Angeles[J]. *Antipode*, 33(2): 260-289.
- Peck J. 1996. *Work-place: The social regulation of labor markets*[M]. New York, NY: Guilford Press.
- Peck J. 2013. Making space for labour[M] // Featherstone D, Painter J. *Spatial politics: Essays for Doreen Massey*. Oxford, UK: Wiley-Blackwell: 99-114.
- Peck J. 2017. Pluralizing labor geography[M] // Clark G L, Feldman M P, Gertler M S, et al. *The new Oxford handbook of economic geography*.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yke F, Lund-Thomsen P. 2016. Social upgrading in developing country industrial clusters: A reflection on the literature [J]. *Competition & Change*, 20(1): 53-68.
- Rainnie A, Herod A, McGrath-Champ S. 2011. Review and positions: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labour[J]. *Competition & Change*, 15(2): 155-169.
- Riisgaard L, Hammer N. 2011. Prospects for labour in global value chains: Labour standards in the cut flower and banana industries[J]. *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y Relations*, 49(1): 168-190.
- Rogaly B. 2009. Spaces of work and everyday life: Labour geographies and the agency of unorganised temporary migrant workers[J]. *Geography Compass*, 3(6): 1975-1987.
- Rossi A. 2013. Does economic upgrading lead to social upgrading in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Evidence from Morocco[J]. *World Development*, 46: 223-233.
- Ruwanpura K N. 2016. Garments without guilt: Uneven labour geographies and ethical trading: Sri Lankan labour perspectives[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16(2): 423-446.
- Sadler D. 2003. Trade unions, coalitions and communities: Australia's construction, forestry, mining and energy un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stakeholder campaign against Rio Tinto[J]. *Geoforum*, 35(1): 35-46.
- Scott J C. 1985.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M].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elwyn B. 2012. Beyond firm-centrism: Re-integrating labour and capitalism into global commodity chain analysis[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12(1): 205-226.
- Selwyn B. 2013. Social upgrading and labour in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A critique and an alternative conception[J]. *Competition & Change*, 17(1): 75-90.
- Smith B E. 2015. Another place is possible: Labor geography, spatial dispossession, and gendered resistance in central Appalachia[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05(3): 567-582.
- Sportel T. 2013. Agency within a socially regulated labour market: A study of 'unorganised' agricultural labour in Kerala[J]. *Geoforum*, 47: 42-52.
- Tufts S. 2009. Hospitality unionism and labour market adjustment: Toward Schumpeterian unionism[J]. *Geoforum*, 40(6): 980-990.
- Tufts S, Savage L. 2009. Labouring geography: Negotiating scales, strategies and future directions[J]. *Geoforum*, 40(6): 945-948.
- Warren A. 2014. Working culture: The agency and employment experiences of nonunionized workers in the surfboard industry[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46(10): 2300-2316.
- Waterman P, Wills J. 2001. Introduction: Space, place and the new labour internationalisms: Beyond the fragments[J]. *Antipode*, 33(3): 305-311.
- Wills J. 2001. Community unionism and trade union renewal in the UK: Moving beyond the fragments at last[J].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26(4): 465-483.

## A review of labor geography research in the West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hina

HUANG Gengzhi<sup>1,2</sup>, ZHANG Hong'ou<sup>1,2</sup>, WANG Yang<sup>1,2</sup>, JIN Lixia<sup>1,2</sup>, CHEN Kunlun<sup>3</sup>

(1. Guangzhou Institute of Geography, Guangzhou 510070, China; 2. Guangdong Open Laboratory of Geospati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Guangzhou 510070, China; 3. Hubei University, Wuhan 430062, China)

**Abstract:** Labor geography, which conceptualizes workers as social actors with agency rather than as a simple locational factor as seen in the neo-classical location theory, has become a thriving and important subfield of economic geography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However, labor geography received little attention in the literature of domestic economic geography despite the rising capital-labor contradiction having been challenging the marketization development in China. Attempting to provide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the Chinese labor geography study,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labor geography literature and identifies its emerging frontier questions. It first explains what labor geography is by examining the concept of worker agency and its spatiality. It then analyzes the progress of labor geography by focusing on the forms of worker agency and its formation mechanism, expounding their connections with space, place,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social upgrading. The analyses show that labor geography has evolved from the narrow focus on collective forms of agency to the expanded one on variegated landscapes of agency that include worker individual social-spatial practices, and from the focus on the forms and influences of worker agency to the structurally territorial conditions that shape the possibilities of worker agency.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re are four important issues for the Chinese labor geography study: (1) the variegated landscapes of worker agency in the context of the trade union institu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2) the potential impacts of labor agency on the restructuring of economic landscapes; (3) the embeddedness of worker agency in places where workers live and work in the context of China with specific institu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conditions; and (4) th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that contribute to social upgrading of workers. This article concludes by calling for the study of labor geography in China, which can provide a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Polanyian countermovement facing current China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the inclusive development in the country.

**Key words:** labor geography; labor; worker agency; space;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social upgrading